

从孔丘之“忧”到教育界的“危机”论

黎 矢

大凡做了复辟倒退的顽固派，总不免色厉而内荏的。这是由他们代表的没落阶级的反动性和腐朽性所决定的。譬如孔丘，当他被宋国的国防部长桓魋（此人曾被孔丘攻击为违反周礼，无疑是个革新派）追逐逃跑时，虽然口中念念有词说硬话：“上天把治理天下的圣德都赋予了我，桓魋这小子能把我怎么样？”心里却只恨不能再生出两条腿来。他还说过：我干起“克己复礼”的事业来是“不忧不惧”的，拚命干；无非人家说我复辟，让他说去，怕什么！可是，面对着先进的封建制代替落后的奴隶制的革命洪流，他却既忧且惧以至于骂街。晋人铸了刑鼎，他忧，说晋国这样搞法，废弃了祖宗的法度，恐怕不要很久就会亡国了啊！少正卯讲学，宣传革新进步思想，和孔丘对着干，他怕，一上台就捏造罪名，把少正卯给杀了。冉求帮助季康子搞革新，他恨，破口大骂冉求不是东西，宣布开除学籍，还唆使徒党对冉求实行围攻。总之，孔丘对社会大变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都是看不顺眼，想不顺心，甚至连酒杯少了四条棱角，也要发顿牢骚，说：“这玩艺那里像个酒杯的样子！”

孔丘又是主张“信而好古”的，认为古时的一切无不比现今的好。古代的典章制度是“郁郁乎”、“巍巍乎”，好的了不得，教育质量也高，就连古人犯错误，也比今人错得高明。至于现在呢？他忧心忡忡地说：“现在许多人是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了好道理不愿实行，有了（违反周礼的）过错不想改正，这些，就是我最感忧虑的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吾之忧也”）。在他看来，现今人们的道德和学问，亦即政治和业务都全面下降了，实在“今不如昔”！孔丘觉得世道其所以坏到如此地步，其所以会发生上面那样许多可忧可惧可恨的怪现象，根子就在于“人心不古”；因此，他决定正人心，办教育。于是，从四十三岁那年开始，孔丘就一面编辑整理据说是从先王那儿传下来的诗、书、礼、乐一类老古董，一面聚徒讲学，培训一批批死心塌地追随他搞复辟、搞翻案的吹鼓手和黑干将。他打算先从教育上打开缺口，推而广之，逐步地把“先王之道”、“周公之礼”全部恢复起来，把社会重新拉回到奴隶制去。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孔丘的这种由忧今而好古、由颂古而非今、由非今而复辟的疯狂性，对于我们今天识别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真面目，是

有所启发的。这些复辟派们也是从忧今，首先从忧教育开始的。他们面对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忧心忡忡地哀叹：现在的学校“轻视理论”，“不讲学文化”，这是“最大的危机”，是在“毁灭教育”，长此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又由忧今而恋旧，说“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成绩”，现在工农兵学员“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又由恋旧而妄想复辟，俨然以“救世主”自诩，神气活现，其势汹汹，扬言：“就是要扭”！“不要怕说复辟”，“横下一条心，拼命干”！

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今天的复辟狂之所以在教育上大作文章，危言耸听地大谈所谓“毁灭”呀，“危机”呀，那是效法孔老二的故伎，想从否定教育革命入手，进而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既然他们给我们强加了种种恶名，其中最令他们痛心疾首因而有“危机”之感的，是所谓“轻视理论”、“不讲学文化”两条，因而，我们不能不就这两条辩驳几句。

一曰：“轻视理论”。用孔老二的话说，叫做“德之不修”。这首先得看是指的什么样的理论。对于复辟派所谓的“理论”，我们岂止“轻视”，进而要鄙视、蔑视，把它批臭！比如我们学历史，对于过去长期毒害人民的唯心主义的“让步政策论”、“阶级调和论”以及英雄史观等类“理论”，我们就是照此办理的。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我们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历来十分重视，从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力求做到精通它，应用它，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试问：在过去的旧大学里，有谁如同我们这样重视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呢？“轻视理论”的罪名加不到我们头上。

二曰：“不讲学文化”。这是孔老二所谓“学之不讲”的今译。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因此，对于文化的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是指反映那个阶级利益的文化和用什么方法去学习文化。对于在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那种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按照所谓“三基四性”的框框，去学习“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封资修文化，我们不仅不仿效，而且要加以批判。但是，我们也决不轻视反面教材的作用。对于古今中外一切多少带有革命性和民主性的人民文化，我们不但要学，而且讲求学的方法，那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着重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问：在过去的旧大学里，有过如同我们今天这样生动活泼地学习过文化知识吗？“不讲学文化”的罪名也加不到我们头上。

恩格斯说：“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毛主席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孔丘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代，奴隶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包括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同时土崩瓦解，这对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和奴隶与平民来说无疑是开心的大好事，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却万分忧伤、难受，哀叹“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大有“危机”之感。今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虽然与孔丘隔了两千多年，但由于同属顽固地要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的复辟派，所以性格也是彼此相通的。这就从历史上和现实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经验：凡是复辟派们感到忧伤和难受的，正是我们革命派应该为之高兴、感到开心的；凡是他们感到发生“危机”了，快要“完蛋”了，就说明我们的事业正是勃勃生机、在胜利前进。